

大象
学术
译丛

[美] 汉斯·凯尔纳 著

韩 震 吴玉军等 译

语言和历史描写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曲解故事

 大象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语言和历史描写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一曲解故事

[美] 汉斯·凯尔纳 著

韩 震 吴玉军等 译

 大象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美]凯尔纳著;韩震等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5347 - 5740 - 2

I. 语… II. ①凯… ②韩… III. 语言学—影响—史学 IV. K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9687 号

大象学术译丛

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

[美]汉斯·凯尔纳 著
韩 震 吴玉军等 译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李建平 石更新

书籍设计 美 霖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北京出版社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3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 65957860 - 351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2008年12月8日

前 言

曲解故事！

我承认,有些词语写入一本关于历史话语的书中很危险,尤其是当作者期望(我的确是这样期望)历史学家以及文学家们阅读此书并且去认真思考它时,更是如此。按照一种有影响的学术传统,平铺直叙地述说故事正是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这种传统假定,首先,存在着一个“故事”等着被讲述;其次,这个故事能够被一个诚实勤勉的历史学家用正确的方法加以讲述。按照这种观点,曲解故事只会导致欺诈、不当或偏执。而这一切我都不会认可。

然而,我不相信那些所谓的“故事”存在于文献档案或以往时代的遗迹当中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讲述。人类活动和这种活动的现存记录,都没有采用这种叙述的形式。它们是复杂文化形态以及根深蒂固的语言习惯的产物。而这种语言习惯源于词语的选择,传统上称之为修辞。构造历史不存在一种“平直的、不加矫饰”的途径,这与历史学家是否诚实和职业特征无关。而诚实的标准和专业化特征,确实可以在那些习惯所允许或要求的东西当中,以及它们所排斥的东西当中找到。全部历史,甚至是长时段的、量化的和共时的描述,都会被有能力的读者理解为一个故事的组成部分,一种明确的叙述或含蓄的叙述的组成部分。那种期望能够获得清白的、未经加工的资料以便能够提供一种更为纯净、更为真实的景象(一种浪漫的景象)的想法,注定要遭受挫折。不存在未被加工过的历史资料;一旦一个文本对象被认定为一种历史资料,它就被深深包含在文化系统当中了。

这样,曲解故事就成了一种解读方法。它意味着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考察历史文本,即将形成其主旨的问题和判断变得更加清晰,而不管这些问题和判

断可能怎样被隐藏起来或掩饰起来。这是一种真实可靠地看待另类历史资料的方法。这些资料不是被发现于历史档案或电脑数据库中,而是存在于话语和修辞当中。换句话说,这是一部有关历史资料的著作。人们一定会同意阿诺德·莫米格莱诺所作的论断。他指出,“整个历史研究的现代方法,是建立在区分原始典据(authorities)与派生典据的基础之上的”。^[1]同时,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在原始的史料与二手的史料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分,并没有考虑另类话语资料,即并没有考虑在语言中(相对于其他人文科学)使描述变得可能、可信以及在伦理方面变得有效的那些史料。

本书的第一部分“另类史料:历史与语言”,总共包括三章,阐述了历史描写的基本问题。“对事实的最大尊重”一章,提出了将在全书中以各种形式重复出现的一些论题,为历史实在论的“另类”史料提供了一例个案,即不为那种“平铺直叙”地解读所见的修辞习惯——对于这种“平铺直叙”的解读而言,文本总是异常地清晰明确。接下来的一章“暂时停顿:历史意识的不连续性”,探讨所谓“历史记录”的非连贯性问题,这一点与叙述性话语的内在连续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第三章“文本的界限:作为章节的历史”中,历史更是被看做历史话语的一个中断,因为历史是在一个必定有开端和结尾的文本当中建构起来的。这与那种认为在文本中过去既没有清晰的开端也没有明确的重点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第二部分“历史学家的语言:四大灾难”中,我更为详尽地考察了一些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文本。弗朗索瓦·基佐是一位精明的社会文明史家,他利用诗人来勾画他们的时代,并且利用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解释他们。基佐对语言和艺术的阐述没有什么疑问,并且这一阐述一直被大量地抄袭。但是当他的有关社会力量、制度及文艺作品所作出的讽喻性结论被变得不具有比较性时,他的技巧就会暂时失效,所留给我们的只是对其方法的粗略一瞥而已。另一方面,朱尔斯·米什莱无休止地与描述纠缠在一起却是另一番景象。对他来说,语言就像历史本身一样是危险的;它既“外在地存在于那里”,又内在于

[1] 阿诺德·莫米格莱诺:《历史编纂学研究》,纽约和伦敦,1966年,第2页。

它自身当中。“法兰西场景”的反叙述性变成了一种亲身的旅行,变成了一种微观的叙述,这种叙述并不将法国历史的所有事件共时地归于自身之中;这种反叙述性由于远离了因时间、事件以及历时性叙述所带来的劳顿,恰好像消失了一般。

IX
尽管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各自处理历史的方法十分不同,但是他们都像《奥德赛》中珀涅罗珀织衣一样拆解了自己的文本。斯宾格勒将其历史洞见的实质建立在本质化的文化描述基础之上,而这种文化描述要受修辞格(这种修辞格将一个体现整体之本质的部分呈现出来,以此来描述事情)所具有的逻辑的支配。但是,那种使斯宾格勒能够审视所有其他文化的他自身的文化,是通过浮士德这一形象来描述的。浮士德这一形象的实质是根本没有什么本质,它宁愿去不断地消除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界限。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也感觉到了同样的不安境况。当他撰写那些打动他并使他认为是历史中最基本、最有意义的层次的事情(即变化缓慢、长时段的地理和经济结构史)时,以名称和直白陈述形式出现的语言就变得差强人意了,从而使得不能把握自己所描绘的东西的那些陈述必须自我关涉(self-referential)。另一方面,布罗代尔认为,一些事件对于与它们并不相关的事件而言,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他撰写这些事件的历史时,语言起到的作用很不错。在他们的每部名著(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不管其是否风行,就其方法而言也是一部力著)中,使历史理解得以可能的修辞结构被其功能肢解了,从而在迫切需要历史理解得以可能的时刻引发了历史理解的可能性问题。

较之全书的其他部分,第三部分“转义与叙事”要更为集中地考察语言问题,尤其是考察转义问题,考察作为思维方式的修辞格。这一部分探讨了转义与历史话语的关系,概述了针对转义的效力而出现的反对和抵制情况(甚至在一些著名的转义行家里手那里也可以发现这种情况)。第八章“秩序的基石:海登·怀特的语言学人文主义”,就怀特的《元历史学》在修辞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内进行了讨论。这种人文主义企图通过对语言的密切关注来解决那些在语言中所出现的棘手冲突。虽然未被人们认可,但怀特的方法涉及一些重

要的结论。这些结论在第九章“作为叙事理论的夸张性比喻：结构还是讽喻？”中做了更加充分的和专门的说明。维柯所谓的转义“四转义系统”，能够产生它们自己的叙述形式，并且支配这一故事。上述情况可以说并不确定，在《元历史学》中怀特正是从这里悄悄地退却了。对于转义所具有的解释力的X 恐惧，会威胁到人类意义（语言系统的“特殊价值时刻”除外）的生成。这一点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以例证的形式进行了说明。第十章“转义学对叙事性：弗洛伊德与形式主义者”，讨论了弗洛伊德是为维护其心理分析权威而如何抑制他的梦喻解释力的。对心理分析中的语言材料的压制，似乎源自这种同样的担忧，即解析本身可能不过是转义中的一系列作用的讽喻而已。

讽喻的类型充斥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讽喻与焦虑”。这一部分讨论了传统历史思维及传统实践与根本不同的历史再现构思方式之间的冲突。在第十一章“三角焦虑：欧洲思想史的现状”中，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三大思潮使历史学家面对着有力的且往往是不可抗拒的解释系统。这些解释系统对自己“科学”外表背后构造性的、讽喻性的特性，几乎不加掩饰。第十二章列出了一批最为激进的“反历史”的大陆思想家，他们新近在历史哲学方面著述颇丰。在上述两章中，像历史学这样的全部解释性活动所具有的讽喻特性，都被强调为引发历史学家们产生某种焦虑的原因。这种焦虑的主要症状是拒绝承认历史思维的修辞性材料。

任何就历史再现的一般性问题进行著述的论者，都将带有一种不可逃脱的、源自专业训练的参照框架。我本人在现代欧洲思想史方面的背景，也清楚地体现在例证与方法的选择上，康德、米什莱、歌德和布罗代尔的名字也接连在几章中出现多次。在历史再现研究方面的其他研究者，亦即“新”历史哲学的其他研究者来自文学、哲学以及其他不同的历史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对历史“文本”（这种文本只能被看做是“曲解故事”）的持续关注，我们大家团结在了一起。这一研究群体所具有的差异性使某些人担心，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只会引发“因入侵而导致的拘捕行为”的出现^{〔1〕}。一些学科，特别是那些相

〔1〕 斯蒂芬·班恩：“历史话语分析”，载《文艺复兴与近代研究》第32期，1983年，第61页。

对新近的学科如历史批评和文学批评,当交叉跨越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相关著述(如本书)也不带有明显的归属标志时,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就会愈发受到苦苦的维护。除了留给圈内学者的专业回报之外,这里的关键是一个更重大的文化问题,即“谁拥有历史学?”如果人们同意赫伊津哈所说的,历史是一种文化对待自己过去的方式,那么,历史理解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事业,而历史想象即使被人们忽视了,它仍是一种重要的人类天赋能力。由于史料从根本意义上讲包含了基本的人类修辞实践,所以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在理解历史上面必须突出其“制作”(making)的一面。曲解故事正是要我们理解到,任何一个故事的系统性都是一种修辞性的创造物,而故事的创造又是人类自我理解和自我创造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XI

致 谢

学术帮助是多种多样的。我本人得到的帮助也是下述列举所远远不能穷尽的。F. R. 安克斯密特、罗布特·伯克霍夫、理查德·布尔、约翰·波尔布瑞克、菲利普·卡纳多、琼森·库勒、乔治·戴拉斯、A. C. 古德森、玛格丽特·格瑞母、琼·费尔曼、米什莱·赫兹、赫伯特·卓斯弗、斯蒂芬·卡布兰、如斯·克米尔、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理查德·麦克森、瓦莱什·马丁、阿兰·米吉尔、詹姆斯·米拉德、罗斯·米克、林达·欧、米彻尔·帕兰社-罗斯、南斯·帕特那、蒂威特·浦莱特、玛瑞·斯瓦兹、理查德·斯坦母尔曼、理查德·万恩以及比尔·文森特,都对我的这项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全美学术委员会、卫斯理大学人文学科中心、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中心、全美人文学科基金、耶路撒冷波特学院、德国沃那-瑞莫斯、斯蒂夫唐和密歇根州立大学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资助。我的妻子如斯·古斯,我的父母弗罗兰斯、大卫·史密斯,我的孩子汉斯、安妮利斯和格瑞泰尔,则给予了我爱意和勇气。

本书的一些章节曾在《历史与理论》、《欧洲研究杂志》、《析辩》、《格鲁林根历史评论》,以及斯蒂芬·卡布兰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主编的《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美国伊萨卡,1982年)上发表过。但所有先前发表过的部分又重新作了修订。

海登·怀特的著作和例证影响了本书的每一处。我谨将此书献给他。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1

第一部分

另类史料：历史与语言

1

第一章 对事实的最大尊重

3

第二章 暂时停顿：历史意识的不连续性

27

第三章 文本的界限：作为章节的历史

55

第二部分

历史学家的语言：四大灾难

75

第四章 基佐与诗人

79

第五章 叙述场景：米什莱中的叙述问题

102

第六章 “储藏室”中的人物形象：歌德、浮士德、斯宾格勒

124

第七章 无序的行为：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文学	155
------------------------	-----

第三部分

转义与叙事

	191
第八章 秩序的基石：海登·怀特的语言学人文主义	195
第九章 作为叙事理论的夸张性比喻：结构还是讽喻	230
第十章 转义学对叙事性：弗洛伊德与形式主义者	253

第四部分

讽喻与焦虑

	267
第十一章 三角焦虑：欧洲思想史的现状	269
第十二章 历史中的叙事性：后结构主义及其之后	294

结语

325

索引

334

译后记

348

第一部分

001

* * *

另类史料：历史与语言

在我们的直觉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历史具有连续性。从当下回溯至宗教改革时代,或者回溯至大宪章、金字塔建造时代,这是一个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连续时间段。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约书亚(Joshua)^[1](得到上帝的帮助)为了获得一场战斗的胜利而能延长一天的时间,时间也不会在睡美人的城堡周围停滞几十年。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直觉,严格说来,这也是不可证明的。而且,历史永远都不能声称自己是对连续不断的过去的(记述),历史充其量是有关过去的文献史料的合理叙述,而不管这些史料是采用什么形式出现。不过很明显,这些史料不是连续的,人类对于时间的有意识的经验也不是连续的。

那么,连续性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凭直觉认为历史是连续的并且要表现和捍卫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和根本的一致性呢?这些假设并非源于文献资料,并非源自现存的历史文本,也不是源自我们自己的生活。相反,认为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是连续的,这一假设是源自于一种文学的根据。连续性并不是事实,也不是明显以非连续性方式存在的东西(如人造物)所具有的形式,而是我们的文化用以表现现实的形式。连续性具体表现于叙述的虚构方式之中,叙述是以前后相继的过程进行“解释”的,即使仅仅是在报道(report)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此就产生了一个足够值得怀疑的观点,即对历史连续性的直觉与文献完整性或个体意识所具有的关联度,要小于它与叙述化理解本性所具有的关联度。“这样,因而……”是一个依赖于概念“因而”之神奇力量的结构。这一结构实质上是去总结那些看上去是某种历史观点的东

[1] 约书亚,《圣经·旧约》中希伯来人的领袖,继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译者注

西。将“这样,那样”提升为一种历史句法结构,表面上看来是在诉求史前的编年史式(或更糟的年鉴式)的表现形式,或是去采取那种天启思想家的灾难性的、难以理解的皈依方式(某种程度上,在布朗和早期福柯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一点)。而且,在此所存在的逗号(“这样,那样”)以及叙述顺序(不是“那样,这样”)也需要加以考虑。我们很难区分由直觉性的现实的连续性与使事物具有连续性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叙述力量之间的界线。

然而,没有什么叙述在其开端和结尾处会看上去像是连续的;在那里,一篇叙述,一段历史是非连续性的事物世界中的一件非连续性的事情,这一事实变得再明显不过了。语言的事实作为叙述性的事实,它会对一般的非连续性感到反感。它是涉及诸多原始资料的资料。在历史文本的边界存在一个一般性的难题:过去被认为具有连续性,将这样的过去所具有的图景呈现出来。如果以巧妙的文学方式开始和结束一个历史文本,那么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本身不就是同样以概念的方式构造出来的文学造物吗?

更多采用文本方法进行历史著述的学者,经常在道德方面受到抨击。我们被告知,“历史”——人类经历的真实的、能够证实的故事——是事实的保证,是人类社会与价值之意义的保证,也是人类自由的保证。有观点认为,历史再现在其所采用的文化形式中有一个确定的基础。这是一种还原论的观点,它力图表明,文本不过是一种虚构物,是一种任意的造物。这种危险行为方式的结果,只能是肆意漠视事实,放弃证实标准,丧失文化认同,以及对以往时代受害者的遗弃和对他们怀念的否定。自从这种批判性的史料研究一开始(不管这种开始被假定自哪里起),对史料深层探究的社会与政治危险就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道德正派的群体需要对事实加以尊重;而且,事实对我们来说要有赖于某种(历史)再现观。论证也是如此。

不过,修辞、叙述和事实是不能相互割裂的。如果它们割裂开来,将会制约那些对于我们的理解、信念和价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类现实。历史实在论者们(较之那些对历史文本之物质实在性持反对意见的人,历史实在论者们实际上对过去时代的物质实在性持支持态度)的道德高标准,总是靠牺牲语言及其规则,即历史再现的另类史料的代价而获得的。

对事实的最大尊重

作为集中考察构成全书随后各部分的引导性章节,本章的目的是可疑的;从一开始我的论点就是,焦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任何有讨论价值的问题的仇敌(尽管是一个有价值的和必需的仇敌)。这些问题包含于历史著述与语言之中,本书全部章节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反复展开的。作为合理话语和思想的一种测量标准,“焦点”与“清晰度”这种光学比喻的效力是如此之大且得到普遍的公认,以至于这种比喻的隐喻身份与含义不为人们所察觉。有时由于它本身是个聚焦得如此完美的概念,我们反倒不能看到“聚焦”所包含的东西。不过,在1985年夏天,我参与了一次交流会,使得焦点概念对我来说成了问题。

那是在西德由《历史与理论》杂志主办的一次有关叙述与历史会议的最后早晨。当时与会者坐在一个巨大的桌子周围,听取了所有的发言,看完了所有的论文,并最后相互述说着各自的看法。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受教于英美学校的历史哲学家,在某个时刻简短地说了一句话。我确信他将这句话当成了清晰自明的东西,把它看做了对于所有真诚关心历史问题的人来说都是个信条的东西。他的这句话就是:“毕竟,重要的是要正确地、不折不扣地理解故事。”坐在桌子对面的一位英国历史评论家,其历史编纂工作一直强调历史思维的结构基础,脱口反驳道:“哦,但你看,问题恰恰是要曲解故事。”在我看来,在这张讨论桌旁对斯蒂芬·班恩的评论做出的面部反应,似乎将这国际研讨会一分为二:一边是一些与会者的微笑,他们觉得自己刚才听到了某种既正确又聪明的言论,尽管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如何“曲解故事”是问题的要害;在另一边,是其他人的那种恼怒表情,尽管他们能够接受历史表现过程从

根本上而言是修辞性的描述的观点,但他们不能接受这一回答的调侃性,不能接受这一回答对认识论职责的放弃以及(也许)对事实本身的否定。

对“曲解故事”我思考了好长时间。我的问题并不是去决定如何搞懂它的意思;相反,它在许多不同方面都讲得通。比如,我很快就想到了海登·怀特在《元历史学》中的论断:正是并非“自然”磨合在一起的解释方式、情节设置、意识形态以及结构之间存在的张力,才使一部著作保持着它特殊的影响力,使其存在于历史编纂的经典之列——这一点与教条主义者(对其所认为的经典)的短暂固守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个意义上,“曲解故事”可以将米什莱和基佐区分开来。这一点甚至要比他们两人在政见和人格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政见和人格的确与他们所选择讲述的故事类型关系非常大。

第二个事件则更带有个人色彩、更为琐细,时间上也发生得更近一些。它将班恩的一段评论纳入了我在此想要阐述的观点当中。几年前,我不再使用看戏时用的的小望远镜,只是时不时在手中摇晃着这个已不能调整好的玩艺儿。它不能聚焦了。因打算买一架新的而去了几家商店之后,我决定再看一下这个出了问题的望远镜所具有的内部结构。我用一个小螺丝刀对那些普通的透视镜片、棱镜和目镜捣鼓了一阵,也未见好。在将它们重新装配起来时,我注意到棱镜膛内每一边上都有几组小孔,里面有很小的螺丝。凭着经验行事,我总算将松动了的棱镜调回原来的位置,最后能够聚焦了。而此前望远镜会生成两个镜像,一个在上方并跑到另一个的边上去了,现在它又是一个放大了八倍的镜像了。在这一偶然发现之前,我一直很明白,我手中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光学变形器,它弯曲、折射光线,再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比如在剧院的包厢中更好地观看《唐豪瑟》与《维纳斯》)将其发送至我的双眼(我想眼睛也做着颇为相同的事情)。在重新调整之后,透视镜片和棱镜就被遗忘了,只剩下更好地去欣赏(或痛惜)眼前的事物了。我观赏到的是真切直白的而非被曲解的东西。可以这么说,望远镜本身已经消失了。于是我想到了班恩的观点。考察历史文本,我们必须将它看做已是“被曲解了的”,即使这样做,也难获得文本的精准意图。真切直白地考察一个文本,是去“看穿”它,亦即根

本不是去理解它,而只是将此过程当成一种有助于了解现实的手段。

实际上,我看戏用的望远镜的例子,与蒂莫西·莱斯在其著作《现代主义的话语》中提出的比喻有很多相似之处。莱斯认为,对于现代认识的“指涉性分析”(analytico-referential)方法而言,望远镜是一个基本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不仅需要符号学(或修辞学)的手段,而且也需要一种关于究竟何为真实性的新观念。

可以说,直到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智力造物,与事物拥有一种极不确定的关系为止,语言这种特别的符号概念,一直将望远镜视为映像(描绘手段)。符号曾经一直(被认为)完全与事物相等同。而现在语言已经变成显现事物的一种手段。它已经在理智与世界之间划分出一个新空间,同时也成为连接这一新空间的桥梁。将一个抽象的系统转变成一种有关真实世界的正确知识(这种知识世界并不是由人所规定的),现在已成为可能。^[1]

文学与历史学曾经同样是“文坛”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领域当中的著者都是通过模仿性的语言来展现世界的。一位诗人可以声称自己能像历史学家那样有力地把握现实,这一点也众所周知,毋须提及。文学作为一种手法,也融入了历史学当中,成为历史学的一种手法。有关历史著述的修辞规则的书籍,迟至17世纪才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撰写出来。^[2]模仿,即描绘外在于描绘者的现实,在古典框架中是文学(也包括历史学)的实质。对于读者的判断而言,这种已逝的模仿是对人类所进行的一种恰当的研究,它是通过修辞方式而逐渐被灌输和表达开来的。这种模式下的历史(伏尔泰、孟德斯鸠、吉布)将自身表现为进行主动反映和主动判断的东西,而非表现为一种从经验角度通过批判的方法加以证实的对已逝现实所进行的描绘。历史叙述者在其文本中,就像18世纪虚构小说的讲述者一样主动和“显露”,这也许是因为两类叙述者心中都有某种特定类型的读者。这些读者有能力思考手边的任何材料所

[1] 蒂莫西·莱斯:《现代主义的话语》,伊萨卡,1982年,第54页。

[2] 阿诺德·莫米格莱诺:《历史编纂学研究》,纽约和伦敦,1966年,第11页。